



吕亮耕诗选

吕亮耕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吕亮耕 诗 选

● 吕 亮 耕 著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吕亮耕诗选

吕亮耕 著

责任编辑：龚湘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25 插页：1

字数：120,000 印数：1—1,800

ISBN 7—5404—0410—8

I·330 定价：3.40元

沉舟已经升出水面

——《吕亮耕诗选》序

徐 迟

这也是一次打捞沉船的工程。诗人吕亮耕逝世，已有十一年余。祝他的灵魂平安！

然则，在时间的逝波里，应该说，还在近岸的浅海里。诗人遗下子女二人。尤以长子宗林，悉心打捞、收集他们父亲已经失落了沉没了的诗作。在诗人很多知交（如易龙云同志）、老友（如孙望、魏荒弩等同志）帮助之下，沉舟终于又浮出水面：龙骨还比较完整，形体的色泽和光彩又重新展现了。

我再次诵读了这本《吕亮耕诗选》，被他的那样精美、情深、形象、光亮的诗篇激动得甚至震慑了。不光是为了纪念这位诗人，他那些诗本身就有留芳百世的不朽价值。湖南文艺出版社能出版他的诗作，不但很有情意，而且很有眼力呢。

然时间的逝波也还冲刷掉了他的一些诗作。它们有的也经受不住冲刷，不知被冲刷到哪里去

了。很可惜，还应当追寻回来。毕竟有不少是追寻不回来的了，令人遗憾。

我和亮耕是同时代人。我们是同年岁的。我比他大一点点，只大了三十五天。不知他是否在1935年发表过诗在《现代》上？1937年，他在卞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戴望舒为编委的诗刊《新诗》上，发表过《Ottava Rima四帖》、《独唱》（外三章）八首诗。《新诗》的主编是戴望舒，在编辑部里跑腿的，有路易士和我两个小编辑。亮耕是1934年来到上海的。当时不是不可能和亮耕见面，一起喝过茶的。迄今年月已这么长久，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只有一些溶溶的波影在动荡，没有十分具体的印象了，但他在赠给我的诗中说了：“我们不曾见过一次面。”大约他是对的，不过我们神交已久。我们都还有许多神交素未会面，“却象是最熟不过的朋友，”非常熟稔，情感很深，永在一淘，再也难忘。“如果要寻找友情的线索，那就是生活，那就是诗。”他说得多好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亮耕的诗是有独特风格、他自己的个性的，很光亮、很开朗，形象特别地鲜明。主要的恐怕是他的诗风表现着一种浓郁的艺术追求，其过于执著，而使有的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亮耕早期的诗歌，象征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忧郁、凝重，大

多是个人感伤情怀的咏叹；后来抗日战争改变了他的认识。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但抗战前夕我们对艺术的追求，不能完全否定掉。一个诗人以追求艺术性作为他的起始点不是什么坏事。倒是不以对艺术的追求作为起始点的诗人到头来可能是可悲的。不过，艺术追求而为现实生活服务的道路是一条健康的道路。抗日战争那样的大的局势也必然能导引诗人们走上为现实服务的健康道路。亮耕在三十年代末写的诗都是抗战文艺了。他写得比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丝毫不差，有些甚至还要强些。他满溢的激情喷涌而出。他决不作干嚷。他写的是诗，今天读起来还令人激动，如《望金陵》、《不死的记忆》、《望江南》、《一面敌旗》等等。在纪念抗战四十周年的今天，他这些战斗的诗篇依然多多的激发了当年的同仇敌忾，也召回来许多记忆。它们是不朽的诗篇。因为写过这些诗，他是永生的诗人。

他在四十年代，先后当了好几家地方报纸的副刊编辑，后又当了三几家地方报纸的总编辑和主笔的职务。可惜的是他在四十年代后半的诗，现付阙如，当时他一定是写了很好的诗篇的。到了五十年代之初，他离开了报纸工作，当了中学语文教员。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的《诗刊》创刊，那时主编臧克家同志和我都比较注意团结二十、

三十年代以来的诗人，竭力要动员并组织他们回到诗坛来。我们找到亮耕，向他约稿，接到了他的《历史画两幅》。喜的是他写得那样美而雄健有力，我们包括吕剑和吴视都是非常欣赏非常之高兴的。那年三月号《诗刊》发了这两首诗。当时真应该鼓励他写一百幅这样的历史大画的啊！六月号又发表了他的《瑶山行》。我们满怀着他的希望，相信他必定能为中国写出瑰丽的诗篇来。但是风起云涌，电闪雷鸣，九月号发表了他的《韶山的农民在战斗》。这首诗，今天看是不妥的，只能“存目”的了。随即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被错划为所谓“右派分子”了，蒙受了一切横暴侮辱和不幸遭遇。整个六十年代贫病交加，而迫害越来越厉害，到七十年代，他完全无法生活下去。不知他是怎样地支撑着的？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高风亮节的人：“愿从劲节求知己，岂向柔枝托至情”（《梅菊吟——赠云虹》）。这样的性格竟不容于这样的社会。到了1974年的国庆前夕，他支撑不下去了，就此离开了人世。他也来不及听到他得到平反的音讯了。我们要控诉那可诅咒的极左路线，迫害了我们如此优秀的诗人。

他曾经这样地引吭高歌啊！“我要告诉远远近近的朋友：/我快乐。生命如春花开放在春天，/阳光在泛滥，哗哗的波浪在呼喊。/原因很简单，

我生活在新中国！”

这首诗题目叫《快乐》。怎不令人读了掩卷凄然？

但是让我们快乐起来吧。沉舟已经升出水面。

1985年10月24日

前 记

孙 望

岁月不居，转眼间亮耕作古已经十一个年头了。

亮耕是一个质朴淳厚、热爱乡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诗人，然而浪迹一生，坎坷没世，这究竟怎么解释呢？难道造物对于善良的人就这么苛刻无情吗？终于，我只好这样想：“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提到亮耕，不由得我不想起咱们一批朋友缔交的往事。我和亮耕初次碰头是在1938年。当时我在长沙，任职于一个管理锑品生产与出口的机关，干的是统计和报关方面的工作。这行当，成日价跟数字打交道，对我来说，真是索然无味！其时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许多文化人都先后转移而集中到后方的城市来了。为了鼓舞民众抗敌的需要，田汉先生在长沙创办了一家《抗战日报》，由廖沫沙同志任总编。沫沙又邀约力扬（季信）、任侠和我，要我们给他的报纸编一个诗歌副刊，目

的是：配合形势，宣传抗日，鼓励士气，促进诗运。当时我们欣然承诺了。计议之下，起了个刊名，叫做《诗歌战线》。意想不到的效果非常好。当3月18日刊出第一期后，接着投稿的信件有如雪片似地飞来了。不少青年还找上门来问这问那，建议以《诗歌战线》为基地，希望借此打开长沙诗歌运动的局面；希望组织“诗歌座谈会”，讨论诗歌创作方面的问题；要求举行诗歌朗诵会，开展诗歌朗诵的活动等等，真是振奋人心。我和亮耕就是在这风云际会的时刻晤面而结交的。

那是3月27日。下班之后，我刚回到寓所，一推门，一个身穿条纹士林布长衫的，面盘圆圆的青年坐在我房间里。立刻，他站起身来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吕亮耕，本省益阳县人，诗歌爱好者。”

使我奇怪的是，他操的却是下江口音。接着他又问我：“前天给你和力扬、常任侠的信，不知你们收到了没有？”

“是的，昨天收到了。”我一边回答，一边请他坐下。

“那么，我的设想，你们觉得怎样？”

“我个人认为很好。不少意见跟我有‘不谋而合’之契。”我不由得笑了一笑，接着又说：“一些想法，好象我们之间曾经预先合计过了似的。”

于是我们便谈开了。都是年轻人嘛，所以谈得很投机。话题，自然不离抗战，不离诗歌。好在彼此无所避忌，谈来很随便，倾吐的都是肺腑之言。话，愈谈愈来兴，以至于浮想联翩，忘记了夜已深沉。亮耕告辞的时候，我叮嘱他下星期二，也就是4月5日一定再来，因为那天我们要开一个小会，讨论《诗歌战线》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題。

自从我们一起开过4月5日的小会以后，我们的形迹益发密切了。只要我公余有一点空闲，便和亮耕一同拆信，一同看稿，一同评优劣，定去取。那时亮耕看来还没有工作，所以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什么业余时间与否的问题。诗刊每逢周五见报，所以每到周四我们便格外忙碌。傍晚时分，任侠、力扬得从湘江对岸赶进城来，跟我们一起定稿，一起跑报社。晚间，两人就在我房间里架起行军床来将就过夜，这几乎已成为惯例。有时，咏泉也打城北赶来，跟我们一路跑印刷厂。我们看着工人排字、拼板、刷样，渐渐也和工人熟悉了。工人见我们前去都很高兴，有时和我们一同商讨板式，也有的时光问这问那，以至有的工人后来变得也爱好起诗歌来了。我们之间要算亮耕跟工人的接触最多，交谈得也最热乎，因为他毕竟是本地人，言语全无隔阂。有时我们几个人

语不达意时，也得他来作疏解、补充或纠正。

星期天，往往是诗社召开座谈会或朗诵会的日子。与会人数不算少，除作为诗社成员的我们这一伙外，主要是长沙本地的诗歌爱好者，其中包括湖南大学的学生。此外，还有不少路过长沙的新老朋友，如千帆、紫曼夫妇，如汪铭竹、吴奔星、李白凤、徐愈以及兼事艺术创作的孙多慈、罗工柳、卢鸿基等，都曾应我们的邀请先后参加过这些活动。一时长沙的诗歌空气着实活跃起来了。

自从任侠、力扬调去武昌以后，《诗歌战线》社这副担子就完全落到亮耕、咏泉、白晚和我等几个人的肩膀上了。特别是我和亮耕，几乎隔天便要碰一次头，形迹益发亲密了。为了支持我们的活动，有时沫沙也来撑我们的场，参加座谈。种种活动占去了我们全部可以利用的时间，的确是够忙的了，但我们枯燥沉闷的生活却赖以得到调济。尤其是看到很多爱好诗歌的长沙青年从战时惶惑消沉的气氛中活跃起来，这给予我们莫大的慰藉，我们也就深感“乐在其中”了。

于此同时，我和亮耕等还一同发起组织“中国诗艺社”，编印《中国诗艺》月刊。诗刊的《征稿小笺》是亮耕草拟的。《征稿小笺》针对当时诗歌创作界严重地存在着的概念化、公式化与标语口号

化的不良倾向而提出了看法，认为诗作者们“老是在蔽塞的小天地中回旋”，乍看起来“虽冠冕堂皇而实际上却空无一物”。因而提出了“要面对现实”及“内容与艺术并重”的主张。“中国诗艺社”的同人就是企图使这股时风有所改变，并愿以各自的创作来实践这种主张。

《诗歌战线》前后共出十八期便停刊了。至于《中国诗艺》，则只出了一本创刊号，第二期正上机待印，却被灾难性的“长沙大火”一古脑儿焚毁了。

我与亮耕欢愉相聚的时间就只这七、八个月。在这七、八个月中，除编诗刊以及开展诗歌方面的活动外，还曾结伴同泛湘江，登岳麓山，寻禹王碑；贾谊宅前，有我们访古的足迹；清秋月夜的圣经书院草坪上空，也曾荡漾过我们朗诵诗歌的声音。看来，我们虽然已忙得“日无暇晷”，可我们却偏要把生活节奏安排得似乎很轻松活泼，很优裕自在。

“乐莫乐兮新相知！”。在长沙期间，我以能结识包括亮耕在内的一批新知为平生最畅快、最值得忆念的事。无奈作为焦土政策的长沙大火，却把我们烧得东南西北各自作“鸟兽散”了。

此后，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彼此失却了联系。我是先撤至永州的，继则到了“连峰际天，飞鸟不

度”的穷山峡谷之县都匀，直至1940时才经贵阳而转赴重庆。就在途经贵阳时，我却意外地和亮耕又一次相会了。当时铭竹先已流落到了贵阳，为糊口计，他赁下一个铺面，竟开起“白鸟书屋”来了。“白鸟书屋”，这名称听起来颇为雅致；经售的是文艺书刊之类，说起来趣味也似近于高尚。可是登门一访，始知原不过是一片寒伧到怪可怜见的“夫妻店”而已。然而却不能藐视它，因为这倒是一个文人们的晤面去处，特别是那些浪迹黔阳的下江文友，时或聚会于此。我之所以能在客中与亮耕再度会面，无疑就是得了“白鸟”之助。可惜我在此地只是中转路过，未能多作盘桓，畅叙别情，总感到颇有遗憾而已。应该一提的是，后来《中国诗艺》的得以复刊，便是“白鸟书屋”主人汪铭竹和我与亮耕等几个人在此会面时倡议于先，以后在重庆又得到任侠、仲年、徐迟、咏泉们的赞助于后的结果。

复刊后的《中国诗艺》先在重庆出版。两期以后，因为敌机昼夜滥炸而改在贵阳印刷。可是即使转移到贵阳，也同样还是成天处于狂轰滥炸的威胁之中，终于出到第四期而停刊了。

当《中国诗艺》复刊期间，我居重庆，铭竹在贵阳，而亮耕却又从贵阳重返湖南去了。但为了商讨编稿方面的事，我们之间还经常有书札往来。

及至《中国诗艺》停刊，书信便逐渐稀少了。后来我离重庆而去成都，亮耕则犹如走马灯似的浪迹于湘西、湘中一带，行踪飘忽，鲜有定所，以至从此又失却了联系。

我与亮耕交往中最耐人回忆的便是这些，其间尤以1938年聚居一城的情景为可念，如果把它说成是我们友谊的黄金时代，这还是很恰当的。自1940年匆匆的贵阳之会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面了。

亮耕比我小两岁，所以在我的记忆里他只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而已。他，中等身材，白皙脸庞，英俊而蕴藉的气度，略近文弱的体质，谈吐则从容不迫，胸无城府。的确，在我们一伙之中，他是个情思饱满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诗人。一直至今，我心头存念着的亮耕，也还是那个年纪轻轻、风华正茂的亮耕。

几乎半个世纪了，失却了联系的昔年老友，我惟有在梦寐中时或见之。这个梦寐中时或见之的亮耕，自然仍旧是年少英俊的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那个亮耕。我时常有那么一种错觉，似乎四十年代以来的光阴比四十年代以前的光阴流逝得要快得多。抗战结束，日本投降；接着是“复员”和跋山涉水的迁徙；接着是解放战争，从而盼来了我们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此后则是一个运

动接着一个运动，人人为应付眼前的任务而忙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自反右斗争以迄于“十年浩劫”，可真是搅得个天地混糊，连鬼神也没个安息之处，这对大小知识分子和新老文化人来说，无异是天外飞来的两场横祸。对于亮耕，我一直怀有两点希望：一是愿亮耕跟我一样“鸿运亨通”，既能漏过“反右”密网，又能幸免于“文革英雄”的刀锯鼎镬之诛。自然，我虽也被关过牛棚，挂过牛鬼蛇神的“光荣牌”，也尝够胆战心惊的批斗，可是我毕竟是活着过来了。我希望亮耕至少也能有我这样的命运。二是愿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与亮耕相见一面，促膝连床、相顾话旧的机会。

然而，美好的愿望终于破灭了！

1981年深秋季节的一天，我忽然接到来自衡阳的一封信，发信人署名易龙云。我不禁迟疑了一下，因为我并不认识他。信里，龙云同志告诉我，他是亮耕的及门弟子。亮耕自被错划为“右派”后，一直在劳动改造中讨生活。“文化革命”的暴风雨刮到时，亮耕除经受百般凌辱折腾外，造反派竟把他每月15元的生活费也反掉了。对亮耕来说，这无异于祸上叠灾，雪上加霜。他，就在1974年9月末的一天，于贫病交迫中与世长辞的，情况十分凄惨。

读信，我简直无法抑制自己的悲感。亮耕既

没有漏过“反右”的罗网，又没有闯过“文革”这座鬼关。尤其令人长嗟不已的是正当黑夜行将过去，黎明即可到来之际，就这么草草地结束了一生，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哩！

其后，龙云同志又介绍吕宗林跟我通信。宗林是亮耕的儿子，业驾驶，在衡阳公路总段工作。他有志为父亲搜集遗篇，出一部诗集，以永其传，也得到了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慷慨承诺。这，借句俗话说来说：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宗林来信希望我写一篇“前记”之类的文章，我不自惭其鄙陋，带着沉痛的心情，追记了我和亮耕之间的这一段弥足珍视的友谊，作为对昔年故友，对一位才华出众然而却坎坷浪迹、托身无所，以至赍志没世的诗人的缅怀与悼念

对于亮耕的诗，我是很喜爱的。我喜读他的《世纪末哀歌》，因为它揭示了旧时代一个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都市——上海的罪恶本质。我也喜读他的《圣诞节》，因为正当平静的教堂将荡起人们感谢圣恩的钟声时，诗人想到的却是世界上还有一连串国家正遭受着战火烧杀的灾祸。诗人的同情是无私地通向一切国家受苦受难的人民。《写给自己》虽则情调低沉，给人以颓丧绝望的哀感，然而不失其为一篇血泪凝成的诗作，是诗人在一定生活处境中思想情绪的写照。的确，对于解放